

第三章

适度人口理论再认识：兼论中国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适度人口

理论是实践研究的基础，理论创新往往又来源于实践。城市适度人口本身属于适度人口的概念范畴，这就决定了塑造城市适度人口理念必须首先从已有的适度人口思想和理论出发；另外，城市适度人口在实践中又取决于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发展形态，包括基本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所以理解中国城市适度人口还必须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相结合。本章首先对国内外适度人口思想、理论及研究进展等进行回顾，从而对适度人口本质进行抽象和再认识，重点重构适度人口的基本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城市化发展进程，对城市适度人口概念进行重塑，为本研究测度和实现城市适度人口奠定理论基础。

第一节 国内外适度人口理论回顾与再认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适度”被解释为“适合要求的程度”^①，说某一事物要保持适度就要根据特定要求保持这一事物的程度，即事物存在的“要求”和“程度”形成对应。“适度”一词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只要有行为主体和行为环境就一定有客观上存在的“适度”。人口也不例外，人口增减行为本身在于人口主体，同时人口也是置身于特定的社

^①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

会经济和生态资源环境，客观上也存在人口的“适度”，适度人口是与人类的出现与发展相伴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现代经济辞典》中，适度人口被理解为“最优人口”，具体为产生社会最大效益的最优人口。^①实际上，适度人口主要是指人口行为应该保持的某种程度，通常所指的主要是数量、结构等行为，什么样的程度主要由人口行为环境对应的要求决定，比如经济产出最大化要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要求、生态环境破坏最小化要求等，包括后来提出的经济适度人口、福利适度人口、生态适度人口等，从存在形态上看还可以分为静态适度人口和动态适度人口。比如：在人类社会早期，因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所需要的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劳动力数量有限，同时由于生活资料和生产能力的局限又会影响人口的供养能力，这样就出现了人口数量生存与供养能力之间的适度。人口数量符合人口供养能力就被视为“适度人口”，生存下来并进行人口的再生产；反之，超过了人口供养能力的人口数量被视为“超适度人口”，最后通过饥饿、贫穷、疾病、遗弃等自然和人为因素又回到“适度”的人口数量。因此，无论何种概念下的适度人口，都与人口所处的特定环境条件紧密相关，因此研究中国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适度人口，最重要的两个内容包括：一是要找到人口本身与行为环境间的关系，二是要发现当前我国城市人口所处的城市发展环境。以下主要针对前者，通过对国内外适度人口理论回顾和分析，抽象出人口与人口行为环境间的关系，探讨适度人口的一般理论机制。^②

一 国外适度人口思想及理论回顾

通过对前人关于适度人口理论研究的归纳和整理发现，国外适度人口

① 刘树成：《现代经济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5。

②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国内外适度人口理论在很多研究中都进行了相关阐述，比如《适度人口与控制》（毛志锋，1995）、《可持续适度人口的理论构想》（原新，1999）、《基于人口、资源、环境约束的人口发展战略规划研究——以嘉兴市为例》（米红，2011）、《城市适度人口容量——理论、方法与应用》（张海峰，2013）等，本研究主要延续上述关于这一理论梳理的主要线索，并以此为主线针对具体内容再查找相关资料进行丰富和拓展，形成适度人口理论发展逻辑框架。当然，重要的还是要为本研究在后文构建适度人口的一般理论机制提供历史线索和演进规律支撑。

理论可以追溯到 2000 多年前的古希腊文明时期。最早，古希腊文明时期的柏拉图提出人口与土地间的适度，相反古罗马重商主义者强调人口增加的好处，提出“实力适度人口”，再后来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学派提出人口与物质财富的均衡发展。在此基础上，古典学派对早期的适度人口思想进行修正，包括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提出以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为前提，认为“劳动报酬优厚是财富增加的结果，同时，也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在此理论基础上，马尔萨斯利用其“两个公理”、“两个极数”和“两个限制”分析适度人口；进一步，穆勒对其进行延续和拓展，提出技术进步在适度人口中的作用。在上述适度人口思想基础上，新古典学派正式提出适度人口理论，包括坎南将古典学派仅仅局限于农业领域的适度人口拓展到各个产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综合生产能力的最优状态作为适度人口规模确定和变化的重要依据。同时，维克赛尔利用“边际生产力理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提出“人口边际生产力”，并正式对“适度人口”进行定义，即“人口达到其数量稍许增加就会导致繁荣不再增加而是减少的那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对新古典学派提出的适度人口理论进行拓展，除了赞同从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角度研究适度人口外，他们更注重从物质财富的社会分配中去探索适度人口。现代欧美及苏联等相关学者对适度人口理论进行延续和发展，1927 年日内瓦第一次国际人口学会和 1937 年巴黎国际人口学会上，适度人口都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在 1937 年巴黎国际人口学会中，兰德里将适度人口与资源相联系；1938 年国际联盟出版《适度人口》丛刊，费伦奇考虑从个人收入最大化衡量适度人口；1952 年索维出版了《人口通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适度人口的概念和理论，并将适度人口从经济领域拓展到非经济领域；美国学者赫茨勒提出人口压力理论，并以此为基础从消费角度阐述了适度人口应该是满足人们最优经济生活水平时的人口；苏联克瓦涅提出了区别于欧美的适度人口理论，即“人口再生产最优类型”理论。伴随着福利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向人口学的渗透，适度人口理论发展不断地从经济增长向社会福利、资源环境拓展（见图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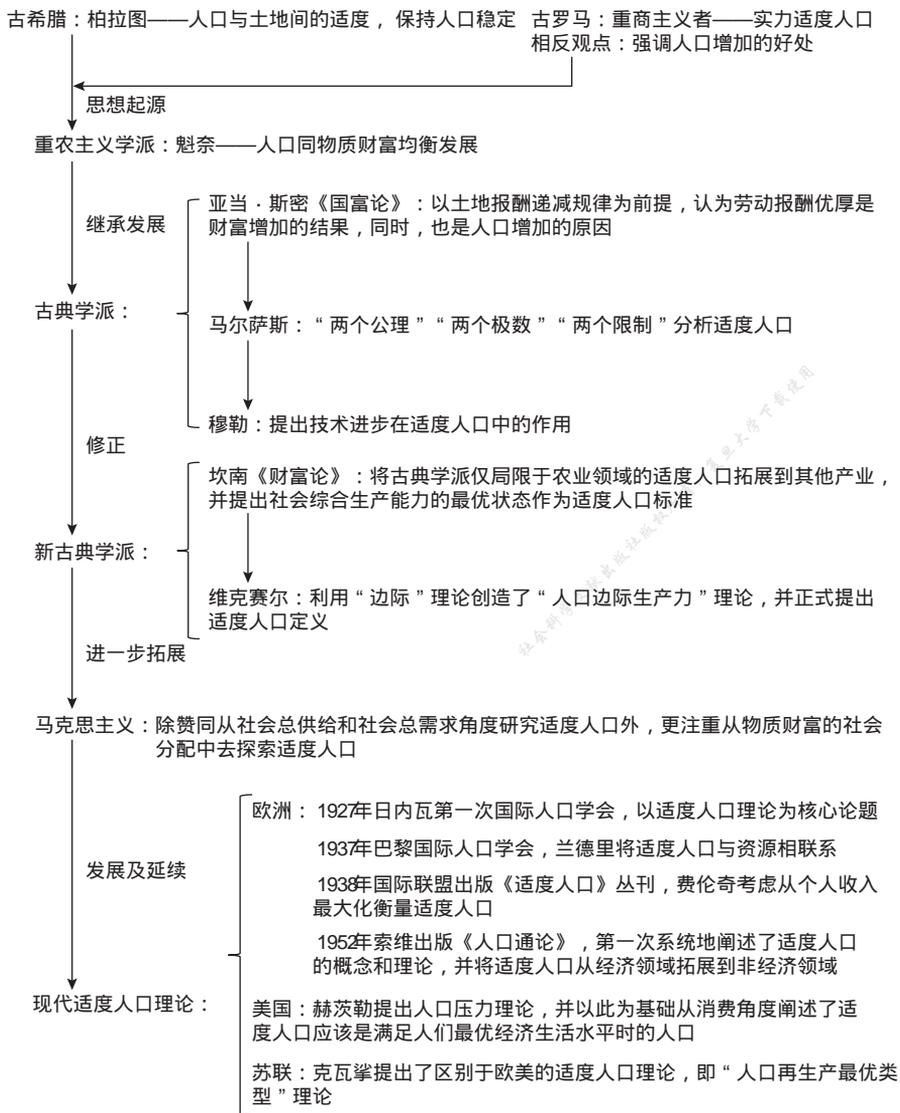


图 3-1 国外适度人口思想及理论发展线索示意图

(一) 古希腊时期：西方适度人口思想的起源

古希腊时期，欧洲国家政治体制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小国寡民的城邦制度。因此，当时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著作《国家论》中提出了“国家论”的假说，并抛出了“人口静止论”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

人口规模应该保持不变，只有静止不变的人口规模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和谐，形成一个理想的完美集团。^① 在其另一部著作《法律论》中，柏拉图通过测算得出 5040 人为一个城邦的“适度”人口规模，并主张通过法律手段来调控人口数量，使之达到 5040 人的“适度”规模。^② 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在其论著《政治论》和《伦理学》中，认为“最完美最美丽的国家，就是能够维持人口数目使之不超过一定限度的国家”^③。他通过一个国家的领土和人口规模的相适应诠释了人口的“适度”规模，既反对人口相对过剩，也不主张人口的相对不足，他提出“适度”的标准就是既能够在经济上满足人们的需求，又能够在政治体制上实现统治者的管理。

简评：古希腊时期适度人口思想认为，国家领土应该与人口规模相适应，这样有利于在既定生产资料条件下满足人口生产和生活消费，同时也有利于国家的统治和管理。

（二）古罗马时期：重商主义学派提出“实力适度人口”思想

重商主义产生于西欧的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即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是 15~18 世纪欧洲普遍推崇的一种经济哲学。重商主义学派认为人口是国力和财富的源泉，他们将人口作为一种发展国家经济的要素和体现军事实力的象征。意大利的人口思想家、早期重商主义者乔万尼·博太罗（Giovanni Botero, 1544—1617）在其著作《关于城市伟大的原因》中，通过“两种能力”（即人口的“生殖能力”和影响“生殖能力”的“营养能力”）分析了无限的“生殖能力”在有限的“营养能力”的约束下，人口数量是不会无限增长的，因此，他认为应该通过“正义、和平及丰富人们食物及商品”的方法来维持城市的人口数量。^④ 实际上，博太罗的观点认为人口要素比国家领土和资本要素更重要，因此他的人口思想更多体现的是“实力适度人口”理论。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

① 张海峰：《城市适度人口容量——理论、方法与应用》，气象出版社，2013，第9页。

② 杨中新：《柏拉图的人口静止论》，《人口学刊》1981年第4期。

③ 毛志锋：《适度人口与控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④ 杨中新：《博太罗的人口思想》，《人口学刊》1986年第4期。

斯·莫尔 (St. Thomas More, 1478—1535) 继承了博太罗的“实力适度人口”的思想, 并在其论著《乌托邦》中试图通过消除私有制来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然而, 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条件的限制, 破除私有制而推行公有制想法只能是“空想”, 但他已经预期到人口的空间分布可能会帮助实现人口的适度规模。^①

简评: 重商主义适度人口思想的核心前提是肯定了人口发挥的生产创造作用, 即人口增加不仅能够增强国家生产能力, 实现国际收支盈余, 还能在军事和战争方面占有优势。针对人口增长超过支撑人口的“营养力”限额时, 重商主义提倡地区间人口互动迁移调整, 保持合理人口密度。

(三) 重农主义学派: 人口与农业生产等物质资料间要保持均衡

18世纪50~70年代, 继重商主义学派之后, 在法国出现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 即重农主义学派。该学派的观点与重商主义刚好相反, 认为人口并不是财富增加的源泉, 而是财富增加的结果, 转而将农业视为财富发展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弗朗斯瓦·魁奈 (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 是重农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 他在其著作《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中明确强调了土地和农业在财富积累中的重要地位, 同时也表示“人们收入的增加比人口数量的增加更重要”。魁奈看到了国民财富的增长会带动人口数量的变化, 并提出人口数量与财富数量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 人口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否则都会影响国民财富的积累。^②

简评: 重农主义适度人口思想的重要前提是农业生产等物质资料是国家富裕的重要源泉, 只有农业生产等物质资料的财富增长才能带来人口数量的增长, 在此条件下人口增长应该与物质财富增长一致, 否则将会减少人类财富的积累。

① J. Overbeek, *History of Population Theories* (Netherlands: Rottedam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3.

② 陈幼其:《试论魁奈的人口思想》,《人口学刊》1982年第4期。

（四）经济学古典学派：构架适度人口思想的均衡体系和基于技术变动的比较静态体系

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巨著《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古典学派正式产生。古典学派所塑造的适度人口思想充分吸纳了重农主义学派的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同时又加入了“均衡原理”。斯密一方面认为任何一个物种的生殖都要受到生活资料的制约；另一方面认为财富的增加能够提高劳动报酬，进而推动人口的增长。当这一“制约”和“增长”的力量达到均衡时，就实现了“适度”状态。这一均衡思想为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①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人口学原理》的出版，真正开启了现代人口学理论的研究。他通过“两个公理”、“两个极数”和“两个限制”阐述了什么是“适度”的人口规模以及如何达到和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生活资料的增长也远不及人口增长的速度，因此，要控制人口的增长。他从生产和消费两个角度论述了“适度”人口，并且主张通过“两个限制”的方法控制人口的增长。另外具有重要影响的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是经济学古典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他同意马尔萨斯关于“适度人口”的观点，并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进行了拓展和深化，将马尔萨斯的“适度人口”思想从静态拓展为动态，同时将技术进步引入到“适度人口”研究，认为“适度”的人口规模不应该是静态的概念，而是随着技术的改良发生“适度”的变化。

简评：包括亚当·斯密、马尔萨斯等在内的古典学派针对适度人口建立起了适度人口理论的均衡体系思想，包括人口增长行为受到的生活资料“制约”和财富带来劳动报酬提升的“促进”间的均衡，这种均衡实际上就是以人口为中心的“生产”和“消费”间的均衡，该均衡下的人口就是适度人

^① 南亮三郎：《人口论史——通向人口学的道路》，张毓宝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第52页。

口，但这种均衡是以人口为中心的宏观生产和宏观消费均衡，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都属于广义范畴。而穆勒在这种均衡体系下，指出技术能够改变甚至优化这种均衡，使得适度人口成为技术决定下的动态变量。

（五）新古典学派：将适度人口在均衡体系中定位到具体确定目标，并发现边际条件

新古典学派关于适度人口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坎南、维克赛尔、卡尔·桑德斯等。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 1861—1935）是近代资产阶级适度人口理论的鼻祖，他针对之前的古典学派关于适度人口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开创了早期的经济适度人口理论。在1888年出版的《基础政治经济学》和1914年出版的《财富论》中，他正式明确了适度人口的概念和理论，真正将适度人口的思想升华为一种研究理论。^①坎南把适度人口定义为“在任何时期，在一定的土地上生存的、达到产业最大生产率的人口是一定的”^②。言外之意，坎南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将产业的最大收益点作为衡量适度人口的标准，当人口数量达到“最大收益点”之前，边际收益是递增的，一旦超过了“最大收益点”，边际收益就变成递减的了，因此，达到“最大收益点”的人口就是最佳的人口规模。随后，坎南又进一步解释了适度人口是否可变的问题。他认为“如果假设无论是整个产业，还是一种产业，最大的收益点是固定长久不变的，那是极为荒谬的。随着知识的进步和其他条件的变化，最大收益点的位置是经常变动的”^③。由于适度人口是产业达到最大收益点时的人口，所以最大收益点的变动自然会带动适度人口的变化。换言之，技术的进步和其他假设条件的放开，推动产业的发展，最大收益点上移，适度人口也自然会向着更有利的方向移动。除此之外，坎南还考虑到了人口的自身发展对适度人口的影响，“我们在考虑某一特定时点的适度人口时，不能只拘泥于那个时期。应该记住，这一代人口是前一代人口存在的结果，并且又是后一代人口出

① 彭松建：《评坎南的适度人口理论》，《经济科学》1984年第5期。

② 坎南：《基础政治经济学》，1888年英文版，第22页。

③ 坎南：《财富论》，1928年英文版，第41页。

现的原因；还要记住，适度人口，就是从长远来看的最适度人口”^①。代际关系也是影响适度人口的内生影响因素，坎南将外生的产业发展因素和内生的代际关系相结合，刻画了长期的运动过程中的适度人口。克努特·维克赛尔（Knut Wicksell, 1851—1926）是瑞典的经济学家、著名的适度人口学家。他正式地提出和使用“适度人口”一词，并于1910年出版了《论适度人口》一书。他眼中的适度人口是“人口达到其数量稍许增加就会导致繁荣不再增加而是减少的那一点”^②，并且主张通过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方法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他认为如果把人口作为消费者看待，那么人口的增长就会带来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减少，进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相反，如果把人口作为生产者看待，那么人口的增长会带来劳动力要素的增加，进一步促进产业的分工和合作。当两种力量相互抵消时，就达到了人口规模的“适度点”。与此同时，他也明确提出这一“适度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科技的进步，会推动工农业的向前发展，国家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规模的“适度点”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③另外，维克赛尔的人口边际生产理论也是在继承了前人关于极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理论对于后来分析人口与经济间关系以及对适度人口规模的预测和计算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应用价值。英国的人口学家亚历山大·莫里斯·卡尔·桑德斯（A. M. Carr - Saunders）是继坎南之后，在适度人口理论方面较具影响力的学者。他认为适度人口是能够“提供按人平均的最大收益”的人口，是人口数量的概念。^④他的最大贡献是继承前人的理论，提出了“适度人口密度”的概念。适度人口密度是在资源既定的条件下能使居民获得最高生活水平的人口密度。^⑤

简评：新古典学派创建的适度人口理论，吸取了之前各种适度人口思想，尤其是古典学派构建的适度人口均衡思想，将一种适度人口思想发展

① 坎南：《经济理论评述》，1930年英文版，第82页。

② 维克赛尔：《论适度人口》，1910年英文版，第831页。

③ 崔功豪、魏清泉、刘科伟：《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第37页。

④ 卡尔·桑德斯：《人口问题：人类进化的研究》，1929年英文版，第476页。

⑤ 卡尔·桑德斯：《人口》，1925年英文版。

为能够基于某一具体目标进行测度和实现的适度人口理论。比如，坎南将适度人口定位为达到产业最大生产力的人口，就是将新古典学派提出的人口生产和消费行为具体到产业收益最大化目标，其中人口生产创造收益，人口消费产生成本，当且仅当人口增加带来的生产收益大于消费成本时，还可以继续增加人口，直到两者相等达到适度人口，不同的是人口生产和消费仅针对产业发展目标而言。维克赛尔同样将人口既当成生产者又当成消费者，结合已有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和“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提出“人口边际生产力”，进一步将适度人口的目标极限条件转化为边际相等条件。卡尔·桑德斯将适度人口数量拓展到适度人口密度，实际上是将土地等资源作为人口生产和人口消费的内生变量，土地等资源的多少影响人口的生产能力，同时也影响人口的消费效用，因为土地等都是生产和消费的资料。另外，上述适度人口都是基于以人口为中心的均衡体系下的边际思想，差别在于不断拓展生产成本和消费效用的范畴，但同时都考虑了知识积累、科技进步等对适度人口的动态影响。

（六）马克思主义：适度人口不仅要考虑社会总供需，还要考虑物质财富社会分配结构

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适度人口是一种“两种生产”相互制约的“适度”，是相对于“过剩”的“适度”。马克思对“适度人口”的理解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产条件是有限的，有限的生产条件只能供养有限的人口，一旦人口数量超过了这个限度就形成了过剩人口”^①。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在理论上承认了人口再生产存在“适度”的界限，同时也揭示了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适度”关系。“过剩人口”是相对“适度人口”而言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绝对过剩的人口规模。马克思认为过剩人口“同并不存在的生存资料绝对量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同再生产的条件，同这些生存资料的生产条件有关，而这种生产条件同样也包括人的再生产条件”，“这种过剩纯粹是相对的，它同整个

^① 张海峰：《城市适度人口容量——理论、方法与应用》，第13页。

生存资料没有任何关系，而同生存资料的生产方式有关”。^①这说明，满足物质资料生产的适度人口不仅仅指人口的数量，还包含了人口结构、人口质量和人口的空间分布等。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力反对古典学派关于人口压迫生产力发展的论断，他们认为是生产力低下压迫人口导致人口迁移，形成相对过剩的人口。在衡量适度人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破了仅从社会总供需的角度考虑，而是从物质财富的社会分配角度考虑，真正做到了从人类自身的利益出发，去寻求真正的适合人类发展的适度人口。

简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适度人口就是要保持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相互适应。但是，物质资料生产不仅取决于人口利用物质资料进行生产的条件和能力，如人口结构、人口质量、空间分布等，还取决于物质资料及产品本身在不同人口中的分配关系和方式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思想下的适度人口理论，更加深入地从人口本身和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等剖析了影响生产能力的技术因素，同时打破了古典主义将人口作为“平等”个体的综合考虑，并在不同社会关系下区分了生产和消费对应的人口结构分布问题，比如马克思说的因为生产资料的分配不公导致需要被抚养的人口出现相对过剩，在此情况下使得生产能力越高就要求人口越少，因为生产能力集中在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

（七）现代西方适度人口理论：开始从生产目标向人的需求转变，并构建多目标决定体系

进入20世纪，西方的人口理论研究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现代西方人口理论主要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流行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人口学说”^②。法国著名的人口学家A. 兰德里（A. Landry, 1874—1956）是人口转变论的创始人，由于受到当时的福利经济思潮的影响，他对于适度人口理论的界定源于福利经济学视角。兰德里定义适度人口为“能保证人种的最大幸福的‘适度人口’，即应确定资源与人口之间最恰当的比例”，并且明确指出“人口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118页。

^② 李竞能、李建民：《当代西方人口学说的源流》，《中国人口科学》1992年第4期。

定适度人口”。^① 美国的社会学家沃伦·汤普森（Warren Thompson, 1887—1973）是人口转变论的奠基人，他特别强调社会福利的变化对人口数量的影响，“不能离开人类现在和未来的福利”研究适度人口问题。同时，他也反对用“纯经济观点”来衡量适度人口，其实影响人口数量变化的因素很多，包括人口结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② 另外，法国著名的人口学家阿尔弗雷·索维（Alfred Sauvy, 1898—1990）是现代适度人口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巨著《人口通论》对于适度人口理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适度人口概念及理论，“适度人口就是一个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之人口”^③，即目标不同，“适度”的标准也不同，第一次将适度人口定义为多目标概念。索维对适度人口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给出了最接近适度人口本质的定义，用不同的目标刻画不同的“适度”人口；第二，提出了具体衡量“适度”的目标，涵盖了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军事目标等九个一级指标；第三，将实力适度人口和经济适度人口进行了区分，一个是在封闭系统中的军事实力适度人口，一个是在开放系统中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的适度人口，并提出了“适度人口增长率”；第四，正式提出了“静态适度人口”和“动态适度人口”的思想，认为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会增加适度人口，即提高人口的承载能力；第五，索维认为“适度人口不过是一个使用方便的概念而已。人口学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工具使用”^④。索维聪明地跳出了“适度”的陷阱，揭示出了“适度人口”本身难以量化的局限性。诚然，索维的适度人口也存在令人遗憾的地方，没有考虑“生态适度人口”，没有将生态目标纳入具体指标当中。

简评：现代西方适度人口理论较为明显的变化是，开始跳出纯经济范畴，逐步开始注重以人为核心，体现人口转变意愿的主动性，比如兰德里

① 斯姆列维奇：《资产阶级人口论和人口政策的批判》，三联书店，1960，第63页。

② 汤普森：《人口问题》，1942年英文版，第5页。

③ 阿尔弗雷·索维：《人口通论》（上），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人口研究室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53页。

④ 阿尔弗雷·索维：《人口通论》（上），第54~55页。

定义的“最大幸福”、汤普森所关注的人的福利以及影响人口行为的诸多因素，索维也是将目标界定为“令人满意的方式”。同时，索维明确指出适度人口与目标相对应，不同的目标对应不同的适度人口，包括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军事目标等，同时，他也认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能增加适度人口，从而正式提出“静态适度人口”和“动态适度人口”思想。

二 中国适度人口思想及研究回顾

回顾我国的人口思想发展史，适度人口经历了从“思想观点”提出到“测度体系”构建和判断的长足发展历程。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历史文化的变迁，适度人口思想观点渗透到不同的领域范畴。在古代，很多哲学家、思想家主要从人口思想中表达对人口多少的观点判断，为适度人口的提出奠定了基础；随后到近现代，社会学家、人口学家等逐步提出人口需要控制并保持适度观点，但新中国成立后“适度人口”论遭到极左理论干预，被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变种，沦为“反马克思主义学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适度人口”这个命题在中国的讨论才再度兴起。

（一）古代：中国适度人口思想萌芽

中国的适度人口思想也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到了封建社会，这种思想得到了发展，在商周时期青铜器上随处可以看到“万寿无疆”“子孙永昌”等铭文。^①到了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②，孟子提出“广土众民，君子欲之”^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④等，这些都体现了这一时期的人口增殖思想，即希望人口越多越好，并成为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对后来的人口思想发展影响较大。与之相反的是主张控制人口，比如战国时期的韩非（公元前280—前233）与马

① 聂志红：《中国经济思想史概要》，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第198页。

② 章培恒：《礼记选译》，巴蜀书社，1990，第159页。

③ 司马志：《诸子百家大讲堂》，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第342页。

④ 李修生、朱安群：《四书五经辞典》，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第73页。

尔萨斯观点一致，他认为人口将呈现几何级数增长，这样将会导致老百姓为了财货而斗争，他在《韩非子·五蠹》中说：“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博，故民争。”^① 商鞅（约公元前 390—前 338）也提出过“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②，上述思想都体现出人口要与财物、土地等保持适度。秦汉时期甚至到了唐朝，由于那时主要是地广人多，虽然像东汉的王符等仍然继承了人口与土地适应的思想，但多数思想家还是呼吁人口增殖。到了宋代和清代，部分较早开发的地区开始出现人口压力，比如康熙将米贵的原因归结为“人多”，他说：“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皆由人多故耳。”^③ 洪亮吉在其《意言》中指出人口的问题在于人口增长过快，但土地、房屋等难以增至之，他说：“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④

（二）近代：中国适度人口观点正式提出

清代后期的汪士铎（1802—1889）提出“人满为患”论，把农民革命的原因归结为“人多为患”，他主张一个国家的人口需要适量，即“民不可过少，也不容过多”^⑤。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陈长衡 1918 年在《中国人口论》中提出他对人口的主张，其中一条就是“适中人口”，即认为人口应当适度，并提出适度人口密度概念，“在适当的人口密度下，才能提高我们国民全体的一般生活标准。而使我们国家民族永久适于生存”，他同时指出中国当时的人口已经超过“适中的人口密度”^⑥。新中国成立以后，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从人口与生活资料、人口与就业问

① 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张海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 314 页。

② 《商君书》，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第 154 页。

③ 复旦大学经济系人口理论研究室：《人口问题与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第 169 页。

④ 孙本文：《孙本文文集》第 6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 216 页。

⑤ 袁宝华：《中国改革大辞典》，海南出版社，1992，第 1136 页。

⑥ 彭立荣：《婚姻家庭大辞典》，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第 31 页。

题两个方面提出“八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①。同时，马寅初在1957年出版《新人口论》，提出“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指出不但要控制人口总量，还要注重人口素质结构、人口与生产就业、人口与资源环境等相关问题，也提出实行人口普查并建立人口统计等措施。^②但不幸的是，当时适度人口理论被当成“马尔萨斯主义的幽灵”被全盘否定，适度人口问题整整停滞了20年。^③

（三）现代：中国适度人口研究再度兴起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适度人口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再度兴起。1981年田雪原和陈玉光指出：适度人口就是带来最大社会效益，主要是最大经济效益的稳定人口，强调人口与物质资料生产的适应，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对人口的决定作用。^④金志指出：适度人口研究都强调适度人口数量的存在；都用福利最大或最高作为标准；都注重自然、经济与人的福利关系分析；适度人口研究的合理成分包括从保持自然生态平衡、联系经济发展状况、联系人口发展质量、动态发展视角四个方面看人口适度。^⑤1984年战捷提出：适度人口就是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并能产生最大社会效益的一定数量的人口，因此适度人口的存在是客观的，确定和实现适度人口目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⑥王冰梳理和归纳了当时适度人口理论的研究，认为适度人口理论问题，当时更多的是讨论适度人口的社会制度性质以及对我国是否具有借鉴作用，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粮食及整个食物资源发展状况、环境生态平衡和淡水资源等的探讨。^⑦彭松建评述了坎南关于适度人口的思想，包括人口与土地的关系、达到产业最大收益点的人口为适度人口、适度人口不是固定不变的等，并指出其最大的错误是脱离社

① 孙本文：《孙本文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76~78页。

② 马寅初：《新人口论》，北京出版社，1979。

③ 王声多：《马尔萨斯人口论述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第158页。

④ 田雪原、陈玉光：《经济发展和理想适度人口》，《人口与经济》1981年第3期。

⑤ 金志：《试析“适度人口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⑥ 战捷：《浅析适度人口》，《人口与经济》1984年第2期。

⑦ 王冰：《近年来我国对适度人口理论的研究》，《人口学刊》1984年第5期。

会生产方式和唯物史来考察人口问题。^① 1985年伍晓鹰对索维适度人口理论进行评述，指出尽管其观点存在资产阶级思想，但其“动态适度人口论”仍然值得借鉴，一是就国内关于“两种生产”应该引入定量分析，二是要用发展经济、推动技术进步方法解决人口问题。同时针对索维适度人口理论的评论还有，杜亚军（1988）^②认为索维提出适度增长节律观点，并构建人口生态理论；左牧华（1990）^③通过深入分析认为索维的适度人口理论并非“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变种”，认为索维适度人口论批判和超越马尔萨斯人口论，尤其是动态适度人口思想对放大我国适度人口的容量具有借鉴意义，一是努力发展新技术、引进和利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引导人们追求合理的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三是提高经济开放度；四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五是提高人口质量。1998年毛锋和叶文虎开始探索适度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重点论述了控制人口与解决就业、贫困等问题的紧迫性。^④ 1999年原新系统地将适度人口演进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早期的适度人口论，即基于经济因素的静态分析；二是现代适度人口论，即将社会因素纳入其中，并进行动态规模和速度分析；三是可持续适度人口论，即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关系系统，同时从动态上考虑人口的规模、速度、质量和结构等问题。^⑤ 2000年以后，我国关于适度人口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尤其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对适度人口理念及目标的认识也不断升华，在适度人口测度的影响因素选择、技术方法构建等方面都有充分的体现。^⑥

简评：第一，中国适度人口思想从原始社会开始就早已有所体现，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人口适度，但在相关史料中已经有人口过多或人口过少观点的交锋，支持人口增长的观点更多的是出于道德观念和增强国家实力，而提倡控制人口的观点则是从人口增长与物质财富、生产资料等

① 彭松建：《评坎南的适度人口理论》，《经济科学》1984年第5期。

② 杜亚军：《索维的适度人口及其人口生态理论体系》，《人口学刊》1988年第4期。

③ 左牧华：《评索维的适度人口理论》，《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

④ 毛锋、叶文虎：《论适度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3期。

⑤ 原新：《可持续适度人口的理论构想》，《人口与经济》1999年第4期。

⑥ 关于我国适度人口理念及思想变化视角下的测度方法（包括技术模型和影响因素）在第三章进行系统回顾和评述。

增长的角度得出的，这些观点为控制人口数量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二，到清代后期，我国实际上已经提出适度人口概念，随后陈长衡、孙本文和马寅初等陆续发展适度人口的标准，不仅包括人口增长与生产资料、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生态环境等之间的适度，还提出了人口结构、素质等自身问题。但不幸的是中国适度人口当时被当成“马尔萨斯主义的幽灵”，被全盘否定，整整停滞了20余年。第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适度人口研究和讨论再度兴起，从适度人口发展来看既传承中国传统适度人口思想和理论，同时又严格坚持马克思主义适度人口观点，通过对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的界定将中国适度人口思想理论与西方资本主义适度人口理论严格区分。第四，中国现代适度人口研究也在不断借鉴和吸取西方适度人口理论的有益方面，比如索维的动态适度人口理论，这时期的学者提出通过技术进步、完善社会生产关系、提高人口质量等来提升适度人口容量空间，对我国人口管理和控制提供有益支持。第五，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适度人口研究也不断从早期的经济适度人口逐步向可持续发展的适度人口过渡，在测度方法、实现模式等诸多方面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

三 适度人口决定机制再认识：“依靠人”和“为了人”的统一

通过上述对国内外适度人口思想、理论及相关研究的回顾和评述，形成适度人口决定的一般理论机制。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体现的适度人口决定机制来看，重点强调以人口为中心的生产和消费间的均衡；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下的适度人口决定机制来看，重点强调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相互适应。这两种思想下的适度人口决定机制从表面上看并没有矛盾，都是从人的生产和人的消费两种视角来找到一种平衡，这种平衡也受到外生技术等因素变化的动态影响，甚至在这种平衡中还找到了确定适度人口的定量边际均等条件。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适度人口确定将人口当成一个总体，掩饰了人口生产和人口消费的内部结构，尤其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归少部分人所有，更多地强调经济生产的最大化目标。尽管也强调人的消费，但在按要素分配条件下，人的消费及满

足受制于要素收入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实质上存在人的生产和人的消费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生活资料分配方式。而马克思主义的适度人口决定机制充分考虑了这一问题，将适度人口的决定因素归结为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相互适应，其本质是人生产和生育意愿及行为，这种意愿和行为本身受制于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影响，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在生产中的地位 and 关系、生产产品分配的形式等。当然，西方资本主义适度人口决定机制中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影响下的动态适度人口，实现人的幸福、人的最大满意目标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思想，均为适度人口决定机制构建提供了较大贡献。根据上述适度人口相关思想及理论，本研究构建了如图 3-2 所示的适度人口决定的理论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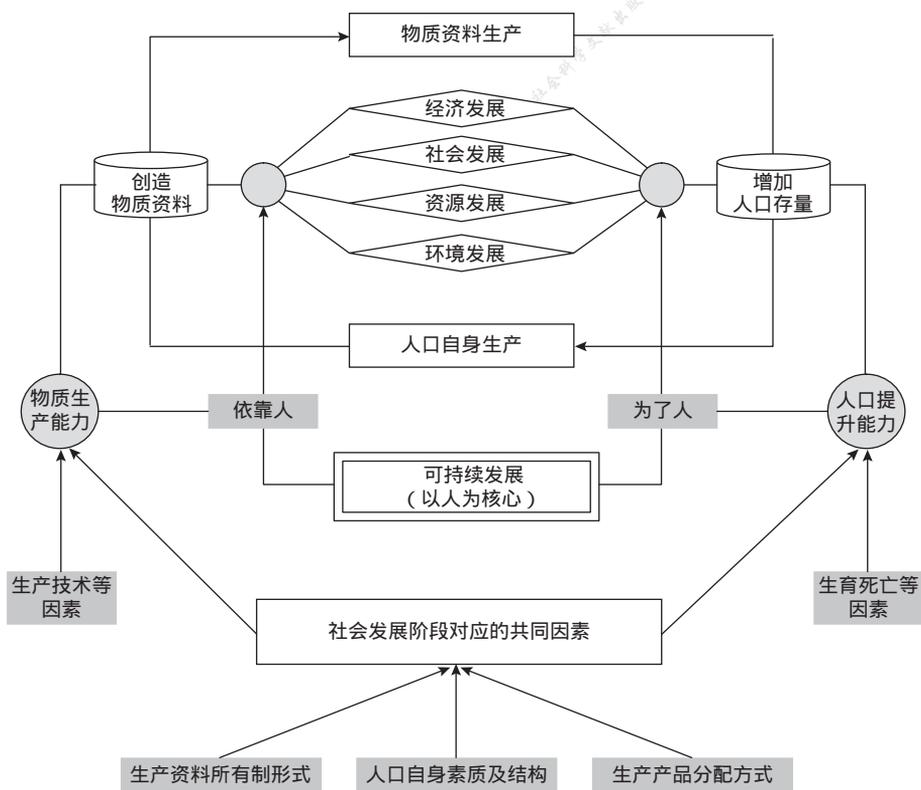


图 3-2 适度人口决定的理论机制

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自身生产，即“两种生产”，但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还是资源环境发展目标，都需要保持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自身生产一致或相适应。再根据既定适度人口内涵可知，这两种生产的一致或相适应对应着既定目标条件的人口数量，即适度人口。

第一，所谓既定目标条件包括经济发展目标、社会发展目标、资源发展目标、环境发展目标等，这实际上是取决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更具体来讲就是以人为核心的发展内涵，充分体现“依靠人”和“为了人”的发展理念，其中“依靠人”实际上是围绕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依靠人来进行创造和发展，属于物质资料生产的环节和范畴。“为了人”实际上是围绕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实现人的需求和满足，属于人口自身生产的环节和范畴。更具体来讲，适度人口就是要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条件下实现“为了人”和“依靠人”的统一。

第二，“依靠人”的内涵是以人口为生产要素创造和生产物质资料，追求的目标是生产效益最大化，即在既定人口水平下得到最大化产出，核心取决于广义上的生产技术，包括人口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为了人”的内涵是以物质资料为基础推进人口数量提升，追求的是生存满意度最大化，即在既定物质资料条件下得到最大化的人口生存意愿，核心取决于影响生育、生活、死亡等相关因素。因此，在确定可持续发展目标范畴条件下，从生产资料生产环节来看，适度人口追求人口边际生产能力最大化；从人口自身生产环节来看，适度人口追求产出边际满意度最大化。

第三，无论是“依靠人”还是“为了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条件下还存在着同时影响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自身生产的相关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三点：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即哪些人拥有生产资料，从而决定有效生产人口数量；二是人口自身素质及结构，包括文化技术等专业素质结构等，这一方面决定生产能力水平，另一方面也决定人口生活需求满意标准层次；三是生产产品分配方式，即哪些人真正参与了社会生产产品分配，从而决定有效的生存消费人口数量。这些因素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差异，共同决定着“为了人”和“依靠人”的统一和平衡。

第四，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条件下，适度人口确定的目标条件要充分考

考虑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之间的内在关系，其中基本条件是经济发展，一方面创造出经济产出，包括产品及服务；另一方面这些产品和服务用以满足人的生活和再生产；最终目标是社会发展，即在物质条件保障基础上追求社会福利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根本在于实现人的发展，包括基本生活水平、公共服务满意程度、人类社会文明等；基础底线是生态发展，即保持资源和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一方面要利用资源环境创造经济社会产出；另一方面也要实现资源环境的修复和再生。当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适度人口目标应该与之对应。确定适度人口，关键在于找准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短板，并围绕“依靠人”和“为了人”提升既定模式下的适应度。

第二节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适度人口概念框架

本研究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适度人口定位为城市适度人口。与一般适度人口决定机制一致的是，都需要围绕人口找到一种平衡关系，包括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自身生产的协调，以及“为了人”和“依靠人”之间的统一；与一般适度人口决定机制不同的是，城市适度人口仅定位于城市，作为人口自身生产而言，其核心并不在于人口的出生和死亡，而在于人口在城市和农村间流动。另外最重要的是，适度人口目标定位及实现要受制于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尤其是不同阶段对应的生产模式和消费偏好。同样，就城市适度人口而言，也需要同城市化进程对应的生产模式及消费偏好等发展形态相互适应，具体来讲就是要针对目前城市化发展存在的问题，通过适度人口测度与实现来对应，最终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升级。因此，本研究塑造城市适度人口概念框架，不仅不能脱离国内外适度人口理论，而且必须要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相联系。以下主要通过基本内涵、依赖条件、运行目标、测度关键、实现重点和保障核心六个方面构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适度人口概念框架，为本课题研究城市适度人口测度和实现提供基本理论和概念的支撑。

一 基本内涵：以人为核心的物质生产与消费满意间平衡

根据上述对适度人口决定机制的再认识，将城市适度人口基本内涵界定为：以人为核心的物质生产和人口消费之间的平衡，如图 3-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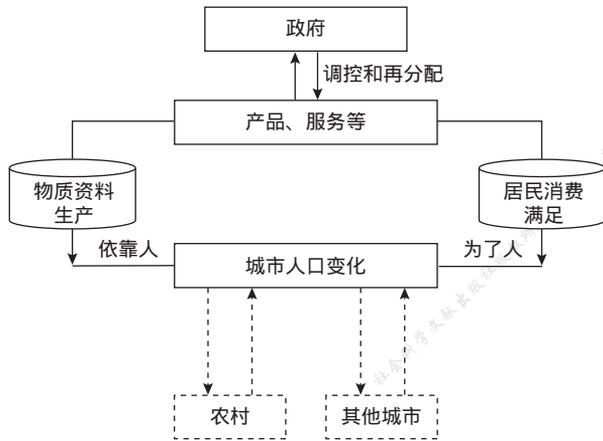


图 3-3 城市适度人口内涵界定的均衡体系

具体包括四个方面内容：（1）以人为核心就是要体现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发展中的“为了人”和“依靠人”的核心思想，其中“为了人”是从消费视角体现城市人口生产出的社会产品要以人的需要偏好和满意程度作为核心标准，要实现人的基本生活和再生产保障，以及人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依靠人”是从生产视角体现城市人口利用物质资料进行再生产，以创造出更多社会产品作为标准，实现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2）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人类社会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自身生产，针对以人口为核心的城市发展也是如此，要保持物质生产和人口消费间的平衡，其中物质生产就是指城市人口利用资源和生产资料创造物质产品；人口消费主要指城市人口对创造的物质产品的消费，在特定消费偏好条件下决定着城市人口是否满意，如果满意则导致更多的人口进入城市，如果不满意将导致人口离开城市，当然这种满意是相对于农村或其他城市而言。（3）适度人口是以人为核心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满意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主要指宏观上的平衡。宏观上的平

衡主要将人口作为总体来看，具有生产能力或生产能力较高的人群将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产出，相反，其他人群不能进行生产或生产能力较弱，技术能力较差等都会导致这种格局，但通过生产要素分配、家庭亲属关系、政府再分配调控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这种宏观上的平衡，这种平衡并非相等。微观上的平衡主要指人口个体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如果出现该个体做出的社会贡献大于其消费受益，这必然导致该个体存在离开城市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进行相关公共服务进行调节，这种微观上的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将难以保证宏观上的平衡。(4) 这种物质生产和消费满意平衡的背后是存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在城乡间流动的自然选择，如果出现大量人口涌入城市，那一定是微观人口个体的物质生产小于消费满意度，当进入城市人口创造小于消费，会继续加快吸引人口的流入，相反就会导致人口流入的放缓，或者具有较高创造能力的人口流出……直到城市人口保持相对静止状态，此时的人口就为宏观上的适度人口。

二 依赖条件：与城市化进程中的生产及消费模式相适应

国内外适度人口理论的演进逻辑告诉我们，适度人口确定与实现和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保持一致。同样，属于城市化进程范畴的城市适度人口确定与实现，也要和城市化进程阶段保持一致。换句话说，城市化进程决定着城市人口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而这种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间相互协调又是确定适度人口的根本和关键。具体来讲：生产模式包括生产关系和生产技术，在不同城市化发展阶段，产业分工、要素分配等都具有差异，同时技术创新、生产能力等也不同，这在城市适度人口确定中直接影响“依靠人”的物质资料生产能力。换句话说，物质资料生产能力可以提升，但特定物质资料生产能力条件下对应着特定数量的城市适度人口。消费模式主要指城市居民的消费偏好和满意度等，同样在不同城市化发展阶段，人口在城乡间转换程度及时间长短，以及物质资料满足和对人口的文明素质促进等，都将改变着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不同价值判断，这在城市适度人口确定中直接影响“为了人”的物质产品

服务满意程度。同样，人的偏好和满意度也可以变化，但特定消费模式下将对应着特定数量的城市适度人口。因此，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适度人口确定一定依赖于城市化进程阶段所对应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不能脱离城市化阶段笼统测度城市适度人口。

三 运行目标：解决城市化存在的问题并推进城市化升级

实际上，城市人口适度与否是城市化进程的不同表现，同时城市人口适度又是与特定城市化阶段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相对应的。因此，实现和保持城市人口适度，不仅仅是数量上的人口增减变化，更重要的是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要不断改变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进而不断实现更多的城市人口对应更高的城市发展模式，实现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升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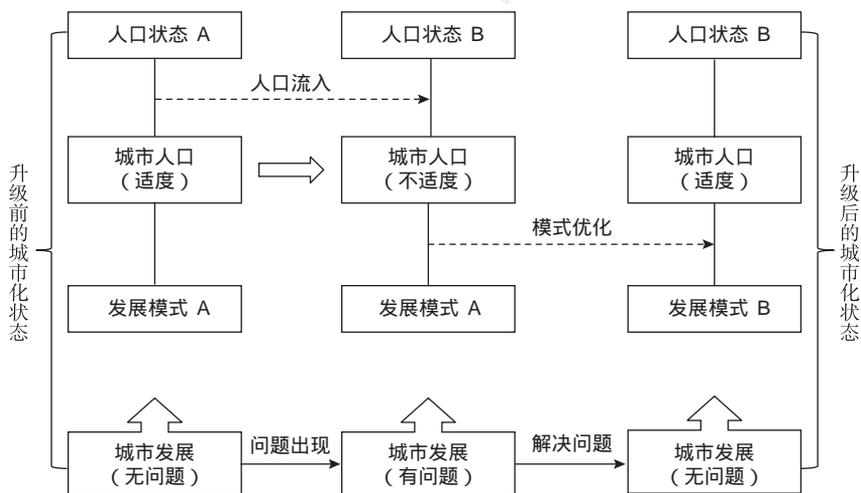


图 3-4 城市适度人口推动城市化升级过程

如图 3-4 所示，我们将人口状态 A 和发展模式 A 对应的城市人口假定为适度，在该状态下城市发展也假定不存在问题，即城市化的原始状态。但伴随着人口不断流入城市，从人口状态 A 转变为人口状态 B，但发展模式没有改变，仍然是发展模式 A，这时表现的城市人口将出现

不适度，同时城市发展也出现相应问题。在这种状态下，要么减少城市人口，要么改变发展模式，前者减少人口将回到原来的适度人口状态，后者通过模式优化为发展模式 B 与人口状态 B 相对应，保持新的城市适度人口状态，从而解决城市发展问题。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发展模式优化，提升了城市人口适度的容量和空间，实现了城市化进程的升级。因此，我们将城市适度人口的实现过程定位为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并推动城市化进程不断升级。测度和实现城市适度人口的基础是要分析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找到测度和实现依据。

四 测度关键：合理确定范畴及目标并找到相对应的短板

测度城市适度人口是本课题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适度人口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测度是要得出城市人口应该是多少，因此，就要寻找相应的参照标准，在本研究中参照标准主要是依据同等条件下具有并实现了更高承载能力的地区。所以，城市适度人口测度的关键内容是，合理确定范畴及目标并找到相对应的短板，具体而言：第一，合理确定范畴。从城市适度人口的依赖条件和运行目标可知，城市适度人口测度要与城市化进程紧密结合，在城市适度人口测度的范畴确定上，需要分析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哪些问题。从前文的城市化发展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在经济运行、社会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污染等方面都存在突出问题，因此，可持续发展思想可以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方面确定城市适度人口测度的目标范畴。第二，合理确定目标。城市适度人口目标是在确定测度范畴的基础上应该达到的程度，实际上是提出一个可行的提升城市人口适度容量的空间。因此，本研究将城市适度人口测度目标定位为同等条件样本范围内，将平均城市人口承载能力作为静态基准，将 3/4 分位标准城市人口承载能力作为动态上限，换句话说，就是把同等条件的城市都能达到的承载力标准作为较低承载力城市追赶的目标。第三，合理确定短板。不同城市的城市化进程面临的经济运行、社会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程度不一致，从而对应

的城市人口承载力水平也不一致，比如有的城市经济运行对应的城市人口承载能力标准较高，但是环境和资源对应的城市人口承载力标准较低，即便这样也不能允许其存在经济运行对应的城市适度人口。因此，需要找到城市化进程中的适度人口短板，只有短板对应的最小适度人口才是应该保持的城市适度人口。

五 实现重点：通过降低成本和提升收益来增加适度容量

城市适度人口测度仅仅得到的是该城市应该能达到的城市人口标准，根据测度关键分析可知，这个标准是参考同类城市已经达到的水平，但实际上的标准还需要针对城市自身提升其城市人口承载能力，即城市适度人口的容量和空间。因此，我们说通过城市适度人口测度来解决城市化存在的问题并推进城市化进程升级，关键就在于如何实现城市适度人口。从城市适度人口测度思想可以看出，实现城市适度人口关键并非改变实际人口，而是提升城市人口承载能力或者说适度的容量。从城市适度人口基本内涵来看，围绕经济运行、社会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污染四个目标范畴，一方面是要降低依靠人的边际生产成本，包括提升物质资料的生产技术等因素；另一方面是要提升“为了人”的边际消费收益，即尽可能提升城市人口对社会提供的各项服务及产品的满意度。由于生产和消费存在城市人口结构差异，在消费上要尽可能发挥政府调控和再分配作用，另外也要引导城市人口生活标准与城市化发展阶段相适应。从降低边际生产成本和提升边际消费收益来看，提升和改善城市人口自身素质结构、完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生产产品及服务分配方式也至关重要。当然，不同的适度人口短板，对应的因素也具有差异，需要合理调整和完善与之密切相关的因素才能真正实现城市适度人口。

六 保障核心：政府推动人口流动转向创造条件引导流动

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适度人口实现，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行为尤为关键。但是，上述对城市化进程的分析已经揭示出，我国城市化根本

上是政策等相关利益诱导下地方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过程。换句话说，是地方政府在主动推动着人口流动，即通过征地、拆迁等行政手段将人口从农村赶入城市，加上在人口不断流入城市过程中，城市发展还缺乏相应的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服务生产能力改善，最终出现的结果便是城市人口失调，同时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问题出现。从本质上来讲，马克思关于适度人口的论述中人口再生产实际上是出于一种自愿行为，同样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是否进出城市也应该是一种自愿行为，这种自愿行为是建立在基于微观视角的消费满意收益大于物质生产成本的基础上，即便是选择离开城市也属于城市人口发展上的自然适度。因此，在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实现城市化可持续发展中，地方政府需要转变职能，由原来的“自上而下”推动人口流动转变为“自下而上”地引导城市人口流动，这就需要在公共服务供给上寻找存在短板的领域并进行有效供给，这样就能合理实现城市适度人口，并解决城市化发展问题，推动城市化进程不断升级。